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6/315
22 July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UG 8 1991

第四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78、79和9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联合国
环境和发展会议社会发展

1991年7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随函送上国际行动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布拉格,1991年5月30日至6月2日)的最后声明。(见附件)

如蒙将上述文件作为大使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78、79和95印发,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不胜感激。

* A/46/150

91-23542

附件

最后声明

第九届会议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布拉格

1991年5月30日至6月2日

1.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政府和各地人民都面临着新的结合和史无前例的挑战。世界已不再由传统的西东敌对所主宰,同时北—南对抗减弱,现在必须尽力解决一个全球性的布置,其特性是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的关系多样性。

2. 目前东欧处于错综复杂的过渡时期,同时又面临着在全球规模上与人口,移民、环境、能源和发展有关以及同国际麻醉药品贩运及其与国际恐怖主义结合也有关系的一些惊人问题。这些影响并威胁到世界的严重问题需要对国际关系做一次重新思考和对世界秩序重新确定。

一. 改革中的经济

3. 国际行动理事会完全赞同皮埃尔·埃利奥特·特律道先生有关改革中经济高级专家组:过渡进程的制限和可能性¹的结论和建议的报告。

4. 中欧和东欧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见的。从一个主要以中央计划和国有制为基础的体系过渡到另外一个主要以市场原则、私有制以及鼓励创业和企业精神为基础的体系很可能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各国不能期望立即就得到益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领导才能和高瞻远瞩对明确制订并协调目的与手段以及对指导无可避免的文化改革将是不可或缺的。

5. 在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持久的改革前程可能会在人民中间造成幻灭,可能对这些国家脆弱的机构和政府有严重的影响,不论它们民主的合法性为何。

6. 在过渡进程期间,必须完成三个关键性工作:

- 采取和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消除不平衡现象以期促进经济增长;
- 与法治和开始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采用和保证财产所有权;
- 分期进行贸易、工业和服务业的私营化和商业化。

7. 虽然在西欧、北美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许多运作令人满意的面向市场经济的模式,但要把这些模式用于中欧和东欧就引起困难。虽然统制经济和中央

计划制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成功，但指示性和参与性规划在许多国家里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基本工具。

8. 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和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在满足个人需要和集体需要方面以及确保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都未能证明是完美的。同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纯粹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经济都是混合制，同时拥有活跃的私营部门和一个大而强有力的、公营部门。

9. 虽然过去两年来公开的辩论都大量集中于私有化问题，但目的与手段必不可混淆。虽然采用市场经济仍然是一个优先目标，私有化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之一。中欧和东欧的经济以及苏联的经济今后许多年可能将是混合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公营部门在市场原则下运作。

10. 这种--常常是突然地--采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失业和其他社会困苦方面会造成其自己的问题。

11. 国际行动理事会认为，中欧和东欧各国优先归还强制取得的财产--而不是作出赔偿--已经阻碍了而且今后作可能会更进一步阻碍私有化进程。理事会促请各国政府重新检查它们有关的法律和政策，确保它们能创造一个有助于私人投资的气氛。

12. 一方面口头和政治咨询之间，以及另一方面政治行动之间的信用差距必须予以弥补。国际行动理事会吁请所有经济制度在过渡中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同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应作出持久努力和继续进行对话。国际行动理事会还促请经合发组织国家政府认真考虑支持并资助在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在苏联进行大规模基础结构投资方案--更不必说对环境无害的技术方案。国际行动理事会鼓励和支持正在进行的采用欧洲环境方案的努力。

13. 今天全球市场的资本和储蓄的稀少肯定会阻碍改革进程。为了缓和这一情势，国际行动理事会促请美国和德国减少它们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国际行动理事会还吁请日本、大韩民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们在中欧和

东欧经济投资。此外，理事会嘱咐所有国家大量裁减其军事支出，从而挪出急需的资源用于民生用途以及促进改革和推动发展等用途。

14. 国际行动理事会促请中欧和东欧各国领袖们研究要汲取的教训和东德过去八个月来造成的错误。

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

15. 国际行动理事会完全赞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关于高级专家小组就“中央银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作用”所得出结论和所提建议的报告。²

16. 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近些年出现了很大变化：如减少规章控制、订立新的财经机制、期货市场和电脑即刻分发信息使市场、机制和货币紧密相联、极大地推动资金的全球流动。

17. 这些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有利，标志着一种积极趋势，但它们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如银行间货币或通货市场上不时出现的拖欠、倒闭或救援行动。从更基本的角度讲，市场间的相互联系会增加出现体制风险的可能。此外，新的全球金融市场还没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提供必要的监督和信息。较弱的经济被一种其毫无直接影响的进程所左右。浮动汇率的益处可望而不可及。各国应如欧洲货币系统那样，寻求建立固定汇率(或是变动幅度小或难以变动的汇率)。

18. 国际行动理事会确信，中央银行及其他决策机构应加紧努力，通过更好、更适宜、更协调的规章增强处理新金融环境中危机的能力。

19. 此外，国际行动理事会认为，现在正适合就中央银行和监督机构在新的金融环境中的作用采取综合办法，以求得稳定、效益和透明度。

20. 坚定致力于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是鼓励金融市场稳定和私人储蓄充足的最佳办法。而实现这一办法的最佳途径则是以达成上述效果为其明确任务的独立的中央银行。

21. 建立欧洲单一货币的行动(国际行动理事会一再表示支持)，应为三极国际

货币体系(美元、日元和欧洲货币单位)铺平道路。对其他货币而言,则可能要单独选择与三者之一(倘若这一“支柱货币”相当稳定的话)或是与三者全体建立联系。

22. 这意味着目前的7国集团将转为3国集团。在这种关系中,少数几个国家应负有特殊责任,就汇率演变、稳妥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方针取得一致。7国集团及3国集团既然承担这一责任,就应当作为世界领导,力求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率趋向一致。同时还应确保与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在此方面,应重新评价和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以保证充分监督富国的经济政策。

23. 关于银行的监督作用,连主要国家之间也情况迥异。今后,在尊重各国自行选择的同时,应强调精简银行规章(建立全国单一决策机构)和银行独立进行监督(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或是一个具体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或是独立或是与其他机构一起,都应监督整个银行系统的财政状况。

24. 对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督工作进行协调,仍极为松散。为此,今后数年需制订更有效的机制,协调对国际性债券中介机构的监督工作,更明确地划定和前后如一地分配监督责任。

25. 国际行动理事会敦促各国政府——至少是经合发组织各国和国外中心——就用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规章的一套标准达成一致。这套标准的基础应是透明度、中立、兼容、管制方面的独立、相互承认和协调标准等原则。

26. 不过,连锁拖欠和体制风险若不同时加以解决,力求使每个银行和市场营业者谨慎从事的监督就不会给市场带来所要求的稳定。因此,中央银行应一如既往,时刻准备在危机时向其自身的银行系统提供偿还能力(“最后办法的放款者”),并在必要时在外汇市场采取一致行动。

27. 中央银行应急切推广加强支付和结算系统的综合方案,其中包括在债券市场建立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健全的交付与支付系统。

28. 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本身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促进实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的一种手段。精减金融规章不应超前于经济整体效率,这一效率意味着劳工市场

的灵活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再接再厉的努力。金融市场对经济的生产性而言,应保持服务行业的功能。

29. 此外,金融市场必须推广信息,加强内部规则,强调长期方式,以及在国内通过合并、获得和集中方面的适当立法,以此给实际经济发出充足的信号。

30. 对期货市场(在金融机制和石油等商品方面)的影响、需求、规章和监督,特别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三. 人口增长、环境恶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31.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53亿人。而在仅仅40年前的1950年,世界人口还不及此一半。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翻一番。这一增长将主要发生在发展中世界,而在1980年代,发展中世界由于人口增长,已经使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下降。在发达世界,目前人口增长是由移民造成,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爆炸性出生率的一种后果。

32. 科学家和有关专家们愈来愈意识到世界人口指数增长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使传统的能源枯竭殆尽,森林被毁,往日的耕地贫瘠荒芜,同时,还使主要是工业化世界过分燃烧碳氢化合物而造成的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温室效应更形严重。气候变化还造成环境恶化,同时使世界人口密集地区生存前景日益暗淡,在那些地区,人口增长已经使发展的努力付之东流。

33. 人口增长造成移民大量涌入城市,并跨越国界涌入较为富裕的国家。城市,特别是较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其增长之迅速,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向发达国家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出现猛增。经济难民如潮似涌不断增长,现在又加之以环境难民。在世界范围内,共有难民约5亿人,到2000年可轻而易举地翻一番。这些迁徙流动显然威胁着政治稳定,并对维护国内与国际和平造成威胁。

34. 地球上现有人口目前直接或间接地消费着40%陆地蕴藏的能源,以解决粮食问题;如果将海洋计算在内,消费量则在50%以上。无论人口如何增长,此种能源使用

是无法加倍的。这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走的是一条不能持之以衡的发展途径。

35. 政治领袖们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由于地球变暖而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已经科学证明,世界正在由一个气候稳定时期迅速走向遥无止境的持续变暖时期,其结果是削弱地球养育其人口的潜力。减慢这一进程速度的第一步是必须停止大气中聚热气体的凝聚。为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目前必须将现有(1990年)矿物燃料的使用水平降低60%至80%。

36. 最近的数据表明,在土地使用方面不断出现化森林为农田、进而出现土地贫瘠的现象。例如,印度约30%的表土已被印度政府正式定为贫瘠土地,既不能耕种,又不能成林,完全成为无用之地。全球变暖无疑会使这些倾向更为突出。

37. 人口增长早已形成势头,其数字之大令人悚然,同时,环境也在明显恶化,尽管如此,对于各国及其领导人来说,努力寻求办法,在国家和国际各级解决这些问题,这不仅是个道义问题,同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也是于己有利的开明之举。

38. 在全球变暖问题方面,国际行动理事会吁请各国政府提供合作,为将于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开展筹备工作,并确保该次会议获得成功,以期签署一项有关温室气体释放问题的国际条约。

39. 关于人口增长问题,国际行动理事会建议将1990年代定为在国家和国际各级推动和执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案十年,并建议大幅度增加此类方案所需资金。

40. 在能源领域,国际行动理事会呼吁经合发组织各国开展合作,率先行动,从事与美国-阿波罗方案相似的大胆的国际研究与开发,确定并生产在技术和经济上均为可行的可再生能源,以替代传统的碳氢化合物燃料。这也包括进一步努力减少工业生产单位所需能源。

41. 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模式造成浪费,使产品耗用大量的原料,而这种状况依然存在。国际行动理事会坚信,各国家政府应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将进一步节约自然资源作为教育的一项主要目标,这既符合其政治利益,也是其道义责任。有人认为人类在免遭其可能的厄运方面回天乏术,对于这种观点来说教育堪称一剂良药。

四. 乌拉圭回合

42. 由总协定主办的全球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正处在关键阶段。如果从现在起一年内达不成最后协议,谈判可能会归于失败。国际行动理事会认为,现在已到紧要关头,必须拿出政治勇气和决心,确保谈判成功。乌拉圭回合如果失败,可能在全球引发保护主义的反应,这对那些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来说将是一个挫败。

43. 国际行动理事会感到总协定现有条例亟需修订,因为这些条例目前仅涉及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制订对劳务、跨境投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性条例,所有这些都将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技术转让。减少补贴会使竞争更为合理,扩大贸易,特别是对于那些无力参与补贴竞赛的国家尤为有利。确保有机会进入购买力高的市场将会增进在那些需要以出口为龙头而进行发展的国家的投资。应当建立更为健全的机制来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抵制单边行动趋势及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

44. 历史曾给我们以沉痛的教训。第二次大战前,自由贸易没有全球性规则,保护主义政策盛行,结果使和平与繁荣的前景遭到破坏。今天再次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世界贸易游戏中的主要参与者可能背弃总协定,转而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行事,从而对弱小国家造成伤害。乌拉圭回合如果流于失败,其导致的灾难将不仅仅是丧失了机会。如果认为世界还将按部就班,同以往一样正常运转,那只是一种幻想。各种区域贸易集团将纷纷出现,以保护主义行动相互厮杀,世界状况将更形恶化。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负有特殊责任维护和发展一个运转有效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其一些关键性政策,如农业政策,应立即予以审查,不再拖延。

五. 南斯拉夫

45. 国际行动理事会极为焦虑地注视着南斯拉夫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使南斯

拉夫国无首脑。理事会认为应竭尽全力防止发生不必要的悲剧,避免流血,否则将会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严重影响。

46. 因此,国际行动理事会呼吁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成员国在1991年6月19日和20日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立即对南斯拉夫采取其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包括必要时适用其争端调解程序,并考虑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对局势进行调查。

下列人士参加了布拉格会议:

一、 国际行动理事会成员

- Helmut Schmidt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Takeo Fukuda (日本), 名誉主席
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 (葡萄牙), 副主席
Andries van Agt (荷兰)
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 (联合王国)
Jacques Chaban-Delmas (法国)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 (墨西哥)
Malcolm Fraser (澳大利亚)
Kurt Furgler (瑞士)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法国)
Daniel Lisulo (赞比亚)
Olusegun Obasanjo (尼日利亚)
Misael Pastrana Borrero (哥伦比亚)
Mitja Ribicic (南斯拉夫)
Shin Hyon-Hwak (大韩民国)
Pierre Elliott Trudeau (加拿大)
Manuel Ulloa (秘鲁)

Ola Ullsten (瑞典)

二、 特邀来宾

Karen N. Brutenz (苏联)
Jiri G. Hajek (捷克斯洛伐克)
黄华 (中国)
Henry A. Kissinger (美国)
Miroslav Kusy (捷克斯洛伐克)
William P. Laughlin (美国)
Robert S. McNamara (美国)
Isamu Miyazaki (日本)
Nafis Sadik (巴基斯坦)
Seiken Sugiura (日本)
Tan Sri Ghazali Shafie (马来西亚)
George Woodwell (美国)

三、 应邀记者

Flora Lewis (美国)-《纽约时报》
Jan Urban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报》
Roger de Weck (德国)-《时代》周刊

¹ 除了特律道先生之外,国际行动理事会下列成员出席了会议: 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 (葡萄牙), 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 爵士(联合王国),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 (墨西哥), Jeno FOCK (匈牙利), Mitja RIBICIC (南斯拉夫), 以及

下列高级别专家: Abel G. AGANBEGYAN(苏联), Henning CHRISTOPHERSEN(丹麦), Vladimir DLOUHY(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Janos FEKETE(匈牙利), Albert FISHLOW(美国), Nathan GARDELS(美国), Robert L. HEILBRONER(美国), Hazel HENDERSON(美国), Rorert KUTTNER(美国), Axel LEBAHN(德国), Emile VAN LENNEP(荷兰), Robert MCNAMARA(美国), Iasmu MIYAZAKI(日本), Goeran OHLIN(瑞典), Jerzy OSIATYNSKI(波兰), Richard PARKER(美国), PU Shan(中国), Stanley SHEINBAUM(美国), Boaventurs SOSA SANTOS(葡萄牙)。

² 除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外, 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下列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葡萄牙)、Malcolm FRASER(澳大利亚)、Olusegum OBASANFO(尼日利亚)、Manuel ULLOA(秘鲁)。与会的还有下列高级专家: Stephen AXILROD(美国)、Victor GERASHENKO(苏联)、John HEIMANN(美国)、Michael HEWITT(联合王国)、Paul MENTRE(法国)、Moeen Qureishi(巴基斯坦)、I.G. PATEL(印度)、Robert RAYMOND(法国)、Donald RIEFLER(美国)、Elcior FERREIRA DE SANTANA(巴西)、Kumiharu SHIGEHARA(日本)、Imre TARAFAS(匈牙利)、Josef TOSOVSKY(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Nobert WALTER(德国)。